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埃德加·斯诺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埃德加·斯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所著《旅行于方生之地》(*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1958)一书的摘译。译文原载香港《文汇报》。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埃德加·斯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43 每册0.37元

(内部发行)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目 录

一	到达中国	1
二	我看到了死人	6
三	上 海	10
四	编辑《密勒氏评论报》	12
五	游历记者	14
六	华 南	18
七	官和贼	21
八	云南的“大鱼”	25
九	同孙夫人的友谊	27
一〇	基督教徒	30
一一	“一·二八”记事	32
一二	安家北京	39
一三	一篇文章	41
一四	语言难学	44
一五	鲁迅印象记	48
一六	一九三五年的形势	51
一七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3
一八	一点启示	58
一九	“无为而无不为”	60
二〇	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	62

二一	从西安到保安	65
二二	抵保安前先晤周恩来	69
二三	在保安会见毛泽东主席	71
二四	到甘肃和宁夏去访问红军	75
二五	日记数则	79
二六	从“西安事变”到抗战	83
二七	出 险	88
二八	战争的本质	93
二九	协助卡尔逊访问延安	96
三〇	同路易·艾黎一道工作	99
三一	在香港浅水湾头	104
三二	同菲律宾华侨相处的日子	110
三三	旧中国的臭牛廐	112
三四	同路易·艾黎的对话	118
三五	强烈的对照	122
三六	战争中的战争	126
三七	蒋介石搞屠杀——皖南事变	128
三八	别了，中国！	130

一 到达中国

我初到上海时，还非常年轻，充满了好奇心，整个身心都向这个世界敞开。我本来可以成为向西迁移的同一代人中的一个，象我的先人一样，为某种边疆梦想所吸引，为某种难以形容的自由召唤所吸引，去寻找出路，去寻求知识，“象陨星一样”没于日落的地方。

我二十二岁那年，曾经在华尔街的买卖中得到了一些钱，当时我想，这就够我作一年极度省俭的旅行，到世界各地去历险了。我计划在一年后回到纽约，在三十岁以前发一笔财，往后就悠闲地从事研究和写作，以终余生。在一九二八年那个时候，这看起来的确是满容易的。

我取道巴拿马运河，动身到太平洋去，在夏威夷和日本逗留了三个月，继续首途上海。在我的旅程计划中，我打算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然而事实上在十三年以后，我才再同美国相见。

当我在国外居留的第一年年底，我在离美国最远的一处地方，它是戈壁沙漠以南干旱而炎热的萨拉齐（译按：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在西北那个地方，我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直到最后，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五百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并且是我所有的经历中最令我毛

骨悚然的，直到十五年以后，我又亲眼看到了纳粹的毒气室，纳粹耐不着性子等待看到别人慢慢饿死，竟把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毒杀于毒气室中。

在上海时，我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递交《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他也是《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派我到西北去的正是鲍威尔，七年后，我就在那里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的
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男女们。

“为什么你不在上海留下来，协助我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呢？”鲍威尔问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就要出版一个特刊了——这个取名为《新中国》的特刊，是要向那些顽固分子（译按：指当时在中国的某些外国人）表明，中国将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情况。我要一个具有新见地的人替我编这个特刊。”

我的见地可够新啦，如果新是意味着不成熟的话。“但是我对中国是毫无了解的，”我回答说：“再说，我预定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不会延长的了。”

“嗯，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但是上海就是中国了。”他大笑道：“你在这里住满六个星期才走吧。到了那时，我相信你将喜爱上海而留下来不走。”

我是另外一种想法；领略过夏威夷的美和日本的妩媚以及井然有序以后，看来上海是决不会引起我的兴趣的。但是我喜欢鲍威尔其人：他的暖人心怀的友情，他用的烟斗，他擅讲故事的奇才。我断定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好，”我说：“就让我们开始干吧。怎样着手编《新中国》

呢？”

为了用稿件和广告填满这个特刊的二百页篇幅，花去了我和我的中国助手三个月时间。我从上海的美国商人或领事馆那里，简直得不到什么合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鲍威尔的大量东方学藏书，并且不要脸地加以剽窃，作我的通讯报道的背景材料。我越是阅读，就越是倾心而耽溺其中。我发现了古代风习的意义，以及它向非常年轻的中国展示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矛盾，我看到，年轻的中国正在奋力以赴，以便在现代世界中占有它的地位。我的第一项任务完成以前，鲍威尔就提出让我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的职务，结果我接受下来。

其后，我写了一系列增刊文章，记叙中国铁路沿线城镇吸引游客的事物。鲍威尔一心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再次在中国旅行是安全的了，而当时的交通部长孙科，也热烈地赞成鲍威尔的主意。孙科答应给我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

“既然赤色分子已被压平，”他对我说：“就没有什么排外主义了。革命已经过去，国家统一了，你将看到人民多么和平而友善。你就报道这些事实吧。”

在其后的四个月里，我就在中国作了一次大旅行，只要那八千英里铁路线可到之地，我都去了，并且极尽豪华和舒适之能事。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我都看到过，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而长城而东北而朝鲜，所有这些地方的风貌，我都熟悉了。有好几个星期，《密勒氏评论报》刊载了许多我写的旅行文章，后来，中国旅行社就把这些文章当作“宣传作品”使用。在我的这次旅行结束以前，我也就看到，这个国家远不是统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开始。

大受启发和几乎完全愉快的日子慢慢过去，接着来到了北京以西的阴森可怖的死亡地带。我到过了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的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太湖上的岛屿，岸边长满了桑树和花丝；杭州西湖的佛寺和宝塔；扬州的优美渡桥和马可孛罗像，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马可孛罗管理扬州城达三年；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水道纵横，以其游船和歌女而闻名；南京的大明城墙，中山陵所在的雄伟的紫金山；接着我又遍历了北方所有的奇观：泰山的圣山，孔子的诞生地和孔庙，以及孟子的故里。最后我到了北京，后来我称之为“故家”，这个城市有着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澄的墙壁，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以及完美的树景。在长城外，我乘坐流线型的舒适火车，在日本人管理的南满铁路上旅行，在沈阳，我访问了东北的年轻统治者张学良。我看到了沙俄建设起来的哈尔滨，那里住满了俄罗斯居民，而在沦为殖民地的朝鲜，我第一次会见了在外国征服者统治下生活的人民。

在这些旅程中，孙科安排了一个（好象）名叫C·T·华盛顿·吴的人帮我的忙。他是一个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四十一岁，他的名片写着他是交通部的“技术专家”。那时候，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习惯上都取一个教名，在华洋社会使用，而吴先生选择的，就是寓有向我们的国父表示敬意之意。我很快就发觉，他对铁路事务是一窍不通的；除了上海和南京以外，他在中国走的地方并不多。他是中国官场的无数食客之一，那些高官为了各种家庭上或私人的原因，总得给他们安排一些闲差事干。但是，如果说吴对寺庙、民俗学或火车头是了无兴趣的话，那末，他对鱼翅可很懂得享受，那是沿途收入微薄的小官员，慑于吴意义

不明的街头，自掏腰包买来孝敬他的。

一天紧张的游览完了，吴常常走到一家旅馆的房间去，吆喝连声。这时，杂役给他端来了热水和热毛巾。他一边用热毛巾揩脸揩手，一边向旅馆门房颐指气使，后者乃“是……是……”连声而退。几分钟以后，就有人来敲门，进去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或者可能两三个一齐来。

那时候，中国各地城市娼妓群集。贩卖妇女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行业。还有大批男童和女童被卖给人口贩子，充当各种各样的契约劳工，包括学徒、工厂工人和家仆。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就被选送到大城市的人口市场去，由候购者买去作姨太太、歌女或女侍。

一九二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共有四万八千名妓女。此外，还有五万名至十万名未纳入正式统计的女子，由贪婪的鸨母陪同，站立于街头和人行道上。在上海中国人管理地区的茶馆和堂子里，另外有着数以千计的妇女。在饥荒、水灾和将要爆发战争的年月里，这些沦落风尘的妇女人数还要增加。

苛捐杂税和过度的田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地把贫苦农民驱离土地。在长期干旱的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完全无以为生，因此卖儿鬻女是寻常事。在上海的外国人老是说：“这些中国人不近人情；他们把孩子卖掉，就如同卖掉一头猪一样。”在一处“租界”里，公共掩埋队不断出动，而在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据报就“掩埋或处理了”二万八千具以上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在街头或河流里发现（大多数是杀婴）。以后的数字就决不会比这个数字低了，可知人们碰到的有比被贩卖更为恶劣的命运。

二 我看到了死人

在整个西北(其面积比美国德克萨斯州还要大)发生大饥荒的时候,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力,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是掌握在阎锡山手中。他从南京中央政府那里,取得一个“绥靖主任”的官衔,而他的同盟者是冯玉祥,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事变期间,冯玉祥曾经帮了蒋介石的忙。但是蒋介石现在对他们两个人都不信任了,因此西北地区的饥荒,就被蒋介石当作迫使他们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没有给受饥灾民送去粮食。

张家口那边,只有虚设的火车从绥远作短距离的来往,贸易活动已陷于停滞状态。在北京——绥远铁路线上,华盛顿·吴一心要在张家口就把旅程结束。他说旅客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争辩说,我是受命考察全部铁路线的,因此坚持继续前往绥远。经过长时间的争论,铁路运输部门的协理才终于安排了一个特别车厢,连在西行货车上,并且充实了粮食和加添了卫兵。他说如果吴不愿意同行,他将同我一起就道。结果吴也随我们一起走了。

火车开离张家口不远,在一个炎热而多尘的旷野小车站停下来,当时,旁边也停了一列对向开行的火车,喘着气的火车头,拖曳着几个残破的车卡。其中有两个货车卡,装满了半裸的小孩子,几乎都是女孩子,他们面有饥色,显得很苍白,看来他们是由几个老妇人和男子照管着。那位铁路运输部门协理告诉我,他们是被送到工场或妓院去的。

在饥荒区的边缘地区，张家口是这种人口贩卖的主要集散地。就在这时，我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里，听到了他叙述中国奴隶苦役的其他详细情况。当时，我们乘坐的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路易·艾黎的一头红头发，在一个车卡出口处的长着黑头发的中国人群中崭露。艾黎曾和我共事，干“中国工业合作社”（译按：简称“工合”）的工作。在那个 small 站上，我要求华盛顿·吴让这个红头人睡在私人车厢未被占用的床铺上，并同我们一起进食。但被这个“技术专家”拒绝了。

第二天，我们到达归化（译按：今呼和浩特市），华盛顿·吴又对我要起态度来了。我同艾黎一起深入这个城市里，了解人们的贫穷苦难情况，翌日，我们到了萨拉齐，这里是铁路的终点，成千上万的灾民，从备受灾荒袭击的平原地区涌到这里来。

我坚持往前走，花几天时间去访问几个僻远的小镇，并横越一度是肥沃农田的沙漠地区，这引起了吴的厌恶。这个技术专家激辩说，这样做同考察铁路情况不相干，他先是缩进特别车厢，说他将一个人往回走，继而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当地有一些父老误认他是一个高级官员，要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乃称他为“大人”。

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象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在各个村庄里，大部分泥砖屋都倒塌了。人们把屋里那么一点点木料拆下来卖掉，以便换来一些钱。

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和树皮充饥，因

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我们抱起这个小孩子，把他送到城里的一个施汤所去。后来，我们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枯得就象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象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这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有气无力地拖着脚步走过去，可能不加注意。我们一行人把这两位妇女送到灾民营去。有这么多的人注定要死掉，因此救回几条人命，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了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被掩埋在墙外的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

萨拉齐居民的生活，比铁路尽处几百英里外居民的生活要好一些。佃户和自耕农已经一连冒了三个春天的险了，但天还是不下雨。为了购买种子，此刻他们已经抵押掉最后一点土地和劳动力，变得一无所有，而买来的种子是不发芽的。由于已经把全部种子播了或吃掉，因此他们面临着即将死亡的命运。但富有的地主却能够活下去，甚至变得更富有。这是一个一袋谷子能够买下一个农场的时候。虽然萨拉齐一带，正在开挖渠道，引黄河之水来灌溉四十万亩土地。小农、佃户和雇工破产了，而高利贷者和谷商却迅速地取得了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通过谷物的囤积居奇，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富户只消付出通常价值的一个零头，就可以把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的宅院和谷仓，由养得很好、忠于饭碗的私人警卫保护着，而另一方面，千百万人则在忍饥挨饿。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冬天，在这可怕的一年里，从长

城以南到黄河之滨，广大的土地都转到高利贷者和在外地主的手中。在我居留中国的其后十二年中，在那片备受蹂躏的广大土地上的某些地区，没有一年不受到旱灾或水灾的袭击。每一次我都看到同样的经济没收在进行，看到同样剥削人的悲剧没有受到制止地在发展，看到农民和女性的地位同样在下降，看到无地农民的人数在不断扩大，看到官逼民反。到了四十年代中期，情况恶化得这么厉害，因此饥荒和起义在中国西部同时发生。在抗日战争进行着的时候，格雷厄姆·佩克就常常看到蒋介石自己的军队大批地开到农村地区去，屠杀饥饿的农民。但是，甚少美国人特意去读佩克的这部题名为《两种时间》的写实之作，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读过格雷厄姆·佩克这部书的美国人，总比读我发表在一九二九年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关于（中国）西北饥荒报道的人来得多。而到了一九四五年，美国却给蒋介石政府源源奉送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钱，不是为了救济饥荒，而是为了建立军事同盟，而对我写的五千字新闻记事的唯一反应，是来自一位美国学童，他寄给我一封信和一张美元支票，嘱我把钱转送给正在忍饥挨饿的中国兄弟。

“在中国，黄河水灾的受害者数达千千万万，”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中的人物伊凡诺夫说：“造化在它对人类无意识的实验中，是慷慨大度的。为什么人类不应该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实验呢？”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是我越发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那一年里，当我们乘火车西行，越过长满了成熟的高粱的金色田野，越过一片翠绿的稻田的时候，我依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的将来，已属为日无多了。

三 上 海

当我和华盛顿·吴依然留在北京的时候，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打电报给我，叫我马上回上海。《芝加哥论坛报》命令他前往东北采访新闻，当时，张学良粗率地企图把在中东铁路沿线工作和居住的俄国人赶走，因之引起了敌对。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张学良要强行取消使得这条铁路成为一项中苏合办企业的协定，这是从沙俄时代继承下来的东西，当时，俄国出钱出工程师修建这条铁路。事实证明，张学良的冒险是灾难性的；苏联军队开入东北，恢复了前此存在着的现状。事后，苏联政府邀请中国人前往莫斯科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其后，使人感到非常惊奇的是，苏联政府把军队撤回西伯利亚。

我回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经到东北去了。我读了他留下来的信，知道他委托我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后来，鲍威尔又从东北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就是这样，我成了一个驻国外的记者，并真正熟悉起上海来了。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内幕作家）约翰·根室只消在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待几天，就能够下断语，说上海是“中国颜面上的一个政治溃疡”。上海已经变得臃肿而腐败，很快就要为过去付出可惊的代价，对于它的过去，上海的西方继承人已经遗忘了。历史总是平心静气的，中国人已经等了一百年了。

但是，一九二八年我到达上海时，居住在那里的西方商人，

其言行举止显得“租界”好象是不动产，会垂诸永久。他们舒适安逸地生活着，觉得自己好象是大陆，而那四万万中国人则是一种近郊，为了做生意的目的，上帝把它安排在那里。

开初，我也误认上海的情况就是整个中国的情况了。非常旧的事物和非常新的事物之间的奇异对照，地方场所的极端难看，以及直言不讳钱就是一切的鄙俗，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迷惑和诧异。开初，我也不明所以地感受到“人群”的压迫。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人（他们是被这么少的人统治着）。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当时上海都是凌驾全国之上。全国一半的入口和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通过上海的。这个城市的核心是“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市区面积只有一万亩，但却居住着三百万中国人和全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产业工人。几千名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及其领事，掌握了全部的实际权力。

“法国租界”是由一小撮法国财主管理着，而“公共租界”则由同样少的寡头所控制。虽然中国人缴纳了几乎全部租税，但是他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占有自己的地产，而必须在登记地产时雇请外国人作名义代表。甚至在那几千名外国人中，只有大财主才有投票权，其人数从来不超过三千。只有到了后期，中国“纳税人”在“公共租界委员会”中才有某些代表权。在日本人统治以前，控制“公共租界委员会”的，总是英国的地产主、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船运公司、纺织厂及其掮客，以及类似的美商人和美国企业。

自然，使上海保持稳定，并对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产生吸引力的，正是英国的法律、秩序和对财产的保护，而这些是以外交、